

编者按

本刊现开设专栏“城市史学史：城市的过往是今日的镜鉴”，由近现代建筑史、城市史领域日本资深学者村松伸教授与国内青年学者赵齐合作撰写。专栏系列文章将回顾城市研究和城市史学发展的历史，探讨史学之于城市学科的意义。本文为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城市代表文明吗？

Does City Represent Civilization?

[日]村松伸 | MURAMATSU Shin 赵齐 | ZHAO Qi

中图分类号: TU-984.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2024)01-0004-07 DOI: 10.12285/jzs.20240130003

摘要: 城市史学在 20 世纪发展迅速，其背后是将城市与文明相连的巨大推力。经历近代与世界大战，在全球格局的变动之下，我们对城市的定位，从一种特定的社会状态，提升到了城市代表人类文明的高度。然而，城市是否真能代表文明？本文将回顾欧、美、中、日近现代城市史发展中观念演变的脉络，在今日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关键词: 城市、城市史、文明、爱国主义

Abstract: Urban historiograph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behind it is a tremendous drive to connect city to civilization. Through modern times and world wars, and under the shifting global landscape, we have elevated the position of city from a specific social state to one that represents human civilization. However, does city really represent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the urban history field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Japan, and rethinks this issue.

Keywords: City, Urban history, Civilization, Patriotism

导言：1913 年的弗朗西斯·J. 哈弗菲尔德与 1961 年的刘易斯·芒福德

20 世纪有许多城市通史著作问世，其中的两本清晰地显示了西方社会城市观念的变化，它们是英国古代史研究者弗朗西斯·J. 哈弗菲尔德 (Francis J. Haverfield, 1860—1919) 于 1913 年出版的《古代城镇规划》(*Ancient Town-Planning*) (图 1、图 2)，以及美国的文化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1895—1990) 于 1961 年出版的《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 (图 3、图 4)。

哈弗菲尔德的《古代城镇规划》将理想的人类社会——即“文明”，寄托于古罗马方格网状的城市规划；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却主张城市本身就是“文明”，并对城市的“发展”提出了

质疑。两本书的出版前后相差将近 50 年，在这期间，城市本身和人们的城市观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作为城市史学史系列论文的第二篇，将继续通过对城市和城市研究的历史性回顾，探索当前城市研究的新视角。本文聚焦于城市在 20 世纪被塑造为文明和进步之象征的过程，以及这种城市观念产生的影响。

一、城市的“野蛮”与“文明”：哈弗菲尔德的《古代城镇规划》

哈弗菲尔德的《古代城镇规划》于 20 世纪初在英国出版，大概是世界上第一部城市通史著作。该书共分十章，为了解书中关于城市与文明的主张及其写作意图，让我们先对其内容和成书背

作者：

[日]村松伸，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赵齐（通讯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助理教授，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协力研究员。

录用日期：202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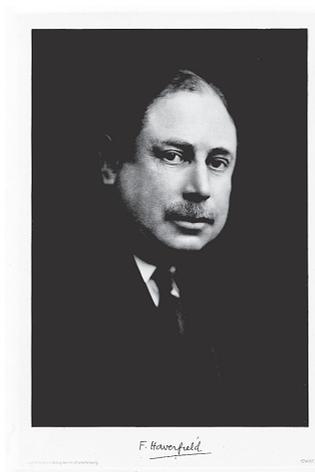


图 1: 弗朗西斯·J. 哈弗菲尔德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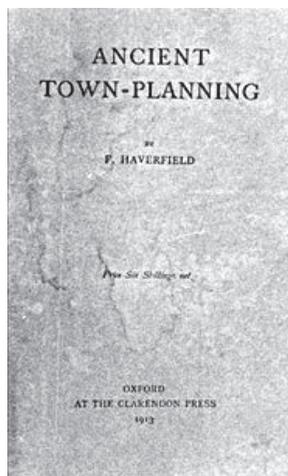


图 2: 《古代城镇规划》(Ancient Town-Planning) 1913 年初版封面



图 3: 刘易斯·芒福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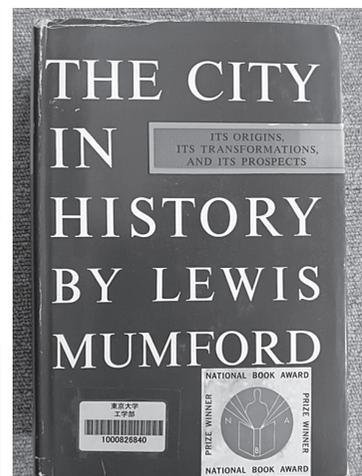


图 4: 《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 1961 年初版封面

景作一番考察。

哈弗菲尔德是当时英国古代史学界的权威，写作本书时，他正在牛津大学担任教授。《古代城镇规划》的结构延续了当时通史式历史著作的惯例，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巴比伦开始，随后是古希腊、古罗马、古罗马帝国的扩张，最后收尾于英国境内古罗马时期的城市。该书综合了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对上述各个时期的城市进行了介绍。哈弗菲尔德在序章中写道：

“绝大多数情况下，城镇的频繁建设都伴随着明确的城镇规划准则的应用……（这种准则）的基础就是直线（straight line）和直角（right angle）。事实上，直线和直角正是将最初级的文明（civilization）与野蛮（barbarism）区分开的标志。野蛮人无法贯彻道德的生活，在建造房屋和道路时也同样无法‘贯彻直线’……当古代遗迹中出现一条长直线或几个精准的直角时，我们就可以断定它们是文明时代（civilized age）的产物。”^[1]

这段话点明了全书主旨，将城市与文明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哈弗菲尔德认为，城市有“直线”和“直角”就是“文明”，“弯曲的小路”则代表“野蛮”。他还称赞“棋盘”式（或方形）的城市是“文明”。这是一个清晰的二元结构：一侧是“古罗马帝国城市”“直线·直角·方形”

以及“文明”，与之相对的另一侧是“周边城市”“弯曲”以及“野蛮”。本书出版时，正逢法属阿尔及利亚开始对古罗马营寨城市提姆加德遗址进行考古挖掘，遗址中一条笔直道路的照片被刊登在书的卷首（图 5）。提姆加德遗址后来成为世界遗产。

本国的城市代表文明，周边地区则是野蛮，这是一种源自古希腊、流行于古罗马时期的观念^[2]。哈弗菲尔德的著作反映了这一观念，其中的二元结构基本继承了英国历史学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主张^[3]。吉本是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1788 年）的作者，这部力作在当时和后世都负有盛名。在该书中，吉本一面对古罗马的城市和建筑大加赞赏，一面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 约 55—约 120）的《日耳曼尼亚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约 98 年），将现在德国境内的森林水沼区域贬低为野蛮之地，称当地人为蛮族，指出野蛮之地需要经历“罗马化”（Romanization）才能成为文明区域。我们可以在哈弗菲尔德的《古代城镇规划》中看到吉本的强烈影响^[4]。尤其是哈弗菲尔



图 5: 《古代城镇规划》卷首的提姆加德遗址照片

德在同一时期还出版了另一本著作《不列颠尼亚^①的罗马化》(*The Romanization of Roman Britain*) (1905年)，整本书都在讲述英国(不列颠岛)如何经过“罗马化”成为“文明”^[5]。在哈弗菲尔德对“罗马化”的推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大英帝国的拥护：大英帝国与古罗马帝国十分相似，都在世界各地扩张殖民地、推进“文明”。但在哈弗菲尔德的著作出版时，帝国已经显露出衰落的迹象。

上述《古代城镇规划》中的二元结构不仅体现了哈弗菲尔德受到的吉本的影响，也反映了当时英国的政治情势。逐步衰退的英国与急剧扩张的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冲突，是《古代城镇规划》出版的政治背景。书中将德意志帝国所在地区的城市贬低为“野蛮”之地，不难看作是对英国逐步衰退的恐惧带来的民族情绪反应。

更为有趣的是，《古代城镇规划》还体现了当时英国城市规划领域相互对立的两种主张。该书的主要内容来源于哈弗菲尔德1910年在伦敦的城市规划会议上发表的演讲。这次会议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城市规划的国际会议，吸引了来自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1400多人参加。在题为“过去的城市”的分组讨论中，哈弗菲尔德以《古罗马世界的城市规划》为题做了演讲。当时，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正在英国兴起(图6)，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次国际会议上，花园城市的推崇者们与支持学院派风格的威权主义城市规划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前者主张的正是道路“弯曲”的规划；后者主张的则是“直线”“棋盘”式的规划(实例见于芝加哥、柏林、维也纳、悉尼等各国首都^[6])。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哈弗菲尔德对于花园城市理论的敌意，也就理解了《古代城镇规划》一书对城市规划实践的立场。

在西方第一部城市规划通史之中，城市被分类为相互对立的“文明”与“野蛮”，这既不是偶然，也并不基于学术中立，而是当时英国政治及城市规划行业中两种主张的对抗所致。

二、“城市革命”：柴尔德和芒福德的“城市即文明”理论

在哈弗菲尔德的《古代城镇规划》出版半个世纪之后，刘易斯·芒福德出版了《城市发展史》(1961年)。在该书的参考文献中，芒福德列出了《古代城镇规划》，并点评道，“年代久远，但在某些方面具有价值”，显然他从该书获得了一些灵感。然而，20世纪初的英国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学术各方面的状况都截然不同。哈弗菲尔德出于对大英帝国衰落的危机感，将“直线”“棋盘”式的城市规划视为“文明”的体现，芒福德则出于对美国城市现状的担忧，指出城市本身正在摧毁“文明”。

“城市作为文明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性发明，从其产生之初便成为内部各种分裂势力的容器，指向无休止的破坏和灭绝。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明的生存，或者更直接说，任何一处较大的、未受残害的人群的继续生存，现在都成了问题。”^[7]

这既是对城市的赞美，也是对城市扩张将导致文明毁灭的深刻忧虑。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 1916—2006)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与《城市发展史》出版于同一年，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Ralph Ehrlich, 1932—)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出版于7年之后，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美国社会对城市持续扩张的危惧。然而，出版时间相差近50年的哈弗菲尔德和芒福德的两本著作，表达出的对城市的危机感却十分不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差异，更是由于人们的城市观念在这近50年间发生了很大转变。在哈弗菲尔德的时代，他将“罗马化”了的城市视为文明；到了芒福德的时代，变成了“城市是文明最宝贵的集体性发明”，换言之，“城市即文明”，所以城市的崩溃就代表着文明的崩溃。

芒福德提出“城市即文明”，标志着城市的观念性地位获得了大幅提升。不

过这一观点并非他独创，而是来源于同时代的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 1892—1957, 图7)著名的“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理论。1950年，柴尔德题为《城市革命》的论文发表在了英国《城镇规划评论》(*Town Planning Review*)期刊上。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考古学论文能够发表在城市规划期刊上，可见这篇论文具有开创性意义。它是考古学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在城市规划学界内外的影响也一直持续到了今日。

柴尔德的《城市革命》论文最著名的是提出了识别城市最初出现的十个标志^②，并且将城市革命与新石器革命相提并论。柴尔德认为，人类早期历史的发展线索是：蒙昧(savage)→(新石器革命)→野蛮(barbarian)→(城市革命)→文明。与哈弗菲尔德静态的二元论相比，柴尔德引入了“进步”(progress)的概念，展示了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的三阶段进化过程，并将各阶段之间的变化定义为“革命”。

三阶段进化的理论让人联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这一理论还可进一步上溯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H. 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1877年)。摩尔根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他通过观察西班牙人“发现”的印第安人，首次提出了“蒙昧”(savage)的概念，以及从蒙昧步向野蛮、文明的进步史观。摩尔根将蒙昧和野蛮各分为三个阶段(即低级、中级和高级蒙昧，低级、中级和高级野蛮)，文明则是第七阶段。他还举出了判断各个阶段的具体标志，比如，中级蒙昧的标志是火的使用，低级野蛮的标志是制陶术的发明，中级野蛮的标志是灌溉农业、使用土坯和石头建造房屋，高级野蛮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文明的标志则是文字的发明。恩格斯沿袭了摩尔根的大部分理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劳动分工的概念，并指出文明的标志包括商人的出现，暗示了城市的诞生。再向前一步，就是柴尔德的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理论了。



图 6：1910 年的国际城市规划会议文集附录的田园城市平面图。在这次会议上，田园城市理论倍受瞩目，这与主办方的初衷背道而驰



图 7：戈登·柴尔德

城市文明化的意义的夸大。在《城市发展史》中，尽管蒙昧、野蛮等概念已经消失，芒福德正是由于抱有“城市即文明”的过高期望，才产生了对当时美国城市的极度失望和对人类文明衰败的过度危机感。

三、当“Civilization”成为“文明”：福泽谕吉与梁启超的近代城市文明

上文探讨了历史上英国社会和美国社会是如何将城市与文明的概念联系到一起的。现在，让我们看看类似的历史过程在东亚的情况，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和副作用。我们首先需要考察“文明”这一词汇的来源。上文使用的汉字词语“文明”，与之对应的是英文“civilization”。这个英文词语在中国、日本、朝鲜及越南，都译作汉字词“文明”，在各国语言中对应不同读音。“civilization”的概念在古代东亚世界并不存在，这个词是如何被译作“文明”而传播开来的呢？

对于“文明”一词在中国和日本出现的过程，历史学界已经考察得十分清楚。19 世纪中期，明治时期日本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1835—1901）在翻译英文“civilization”时，第一次使用了古汉语词“文明”。这一翻译随后传入中国，19 世纪末，梁启超、严复开始在中文中使用“文明”一词。至于这个词语是如何传到朝鲜和越南的，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但我们可大致推测朝鲜是受了日文的影响，越南则受了中文的影响。

“文明”一词曾作为古汉语词在《周易》和其他中国的古书中频繁出现，也曾被用作年号，不过含义与今日不同。福泽谕吉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古文教育，得以从古文中选出“文明”作为“civilization”的翻译。随后，福泽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文明的理论书籍，最受欢迎的一本是《文明论概略》（《文明論之概略》，1875 年）。他参考巴克（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1864—1868 年）、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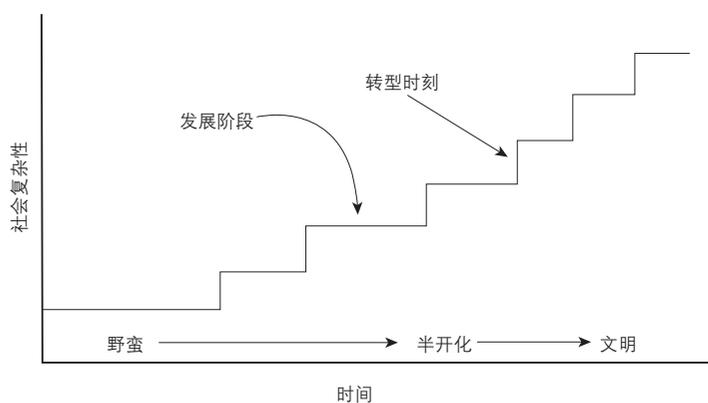


图 8：詹宁斯绘制的古典文化进化理论的阶梯状图示

2016 年，美国的安第斯文明考古学家贾斯汀·詹宁斯（Justin Jennings）出版了名为《文明之死：再审视早期城市化及其后果》（*Killing Civilization: A Reassessment of Early Urbanism and Its Consequences*）的著作。正如措辞激烈的书名，该书强烈批判了摩尔根等人 and 柴尔德的文化进化理论，认为不应该让城市肩负文明的重担。詹宁斯指出，文化进化理论按固定阶段概括人类社会的变化是不自然的，他还质疑了判断各发展阶段的标志的合理性（图 8）。比如，按照柴尔德的城市革命理论，十个标志不全部出现就不是城市，这是很值得怀疑的^[8]。

上述“城市即文明”和三阶段进化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用蒙昧、野蛮等具有歧视性的术语给特定时期的社会“贴标签”。这是一种在当今学术界被称为“心理本质主义”（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的认知方式，朴素地认为任何人和群体都能归结出一种“本质”。蒙昧、野蛮、文明这些概念，是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摩尔根在观察和分析北美印第安人后创造出来的。其实，按照芝加哥学派路易斯·沃思（1897—1952）的定义，城市只不过是具有相对较大人口数量和密度的人类聚居区。对城市过高地赋予价值，会导致对非城市社会状态的不必要的贬低，以及对

佐 (F.P.G. Guizot, 1787—1874) 的《欧洲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1835年) 和美国的中学教材, 也提出了三阶段进化理论, 三个阶段依次是野蛮、半开化和文明。在福泽的理论中, 处于野蛮(对应英文 savage 或 barbarians) 阶段的是非洲和澳大利亚; 处于半开化阶段的是土耳其、波斯、中国(清朝)、日本等国, 这些国家需要努力才能达到西方近代文明^[9]。

那么近代文明具体指什么呢? 福泽在 19 世纪 60 年代第一次赴西方巡游之后, 写成了《西洋事情 初编》(1866 年) 一书, 该书扉页的插图(图 9) 清晰地展示了近代文明的组成要素。这幅插图题为“蒸气·济人·电气·傅信”, 即蒸汽动力、裁判、电力、电报。福泽又在书中介绍了西方出现的新的公共设施及其功能, 如学校、医院和博物馆等^[10]。福泽和当时的日本主流社会认为, 日本需要脱离半开化状态, 达到西方的近代文明, 换言之, 文明只存在于日本之外的西方。

在中国, 首次翻译了“civilization”一词的是与福泽谕吉同时代的清朝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1818—1891)。他在 1878 年 2 月 5 日发给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方电报中介绍了西方的文明理论, 将“civilized”“half-civilized”“barbarian”直接音译为“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巴尔比里安”, 用“教化”“夷狄”等中文词语与之对应。清政府认为郭嵩焘抬高西方、诽谤清朝, 将他解职, 直到近年这些电报内容才被世人注意, 对“文明”等概念的音译自然也没有机会传播^[11]。文明论在中国的展开要等到梁启超的时代。

梁启超在 1898 年流亡日本之前就开始使用“文明”一词了。接触到福泽谕吉的著述之后, 梁启超更加频繁地论及“文明”, 尤其是在 1899 年《清议报》的《饮冰室自由书》栏目中, 他以“文野三界之别”开头, 说明了从“蛮野”, 经“半开”, 到“文明”的“进化之公理”^[12]。梁启超的这一观点大体基于福泽的《文明论概略》^[13], 而且他也认为文明存在于中国和日本之外。

1903 年 2 月至 10 月, 梁启超首次访问美国。随后出版的《新大陆游记》(1904 年, 图 10) 中可以看到他对纽约城市发展的惊叹^[14]。梁启超写道:“野蛮人住地底, 半开人住地面, 文明人住地顶。住地面者, 寻常一两层之屋宅是也……纽约之屋, 则十层至二十层者数见不鲜, 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层, 真所谓地顶矣。”^[15]

除了上述对城市景象的描述,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对美国的“文明”的记述主要是针对政治和社会制度, 革命热情跃然纸上。然而, 与“文明”一词一同被引介到了中国的, 是最初产生于西方的野蛮、半开化、文明的进化理论, 以及福泽谕吉的“文明”在于外部(即西方世界)的理论。在这一时期, 中国和日本被迫将自身以“半开化”的定位纳入西方自我中心的框架, 并试图追赶西方的“文明”。

四、夯土与柱洞：爱国主义与城市文明

上述福泽谕吉和梁启超的进化理论以及学习西方的主张, 源于两人对西方城市文明的真切感受, 他们也希望通过建立与外部“文明”的联系, 提升祖国的国际地位。

类似情况在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1868—1954) 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作为近代时期日本第一位建筑史学家, 伊东

忠太最为著名的是试图证明古代日本与古希腊文明的联系。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法隆寺, 认为梭柱来源于古希腊柱式的收分, 是通过印度北部的犍陀罗传到日本的。这意味着近代时期“半开化”的日本在古代就已经与西方文明的起源地古希腊建立了联系, 换言之, 日本建筑是起源于正统的。

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中国文明“西来说”, 但都是外国人提出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出生于法国的英国汉学家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5—1894) 的中华巴比伦起源说(Sino-Babylonianism), 认为中国人是巴比伦人的后裔。这种说法如今看来荒谬可笑, 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时, 曾受到了一时的追捧。另一种“西来说”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 1874—1960) 的主张。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的安特生根据考古挖掘成果, 认为仰韶的新石器文明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 这一基于科学发现的学说当时在中国内外获得了不少支持^[16]。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1929 年, 李济(1896—1976) 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首任考古组组长, 主持对安阳殷墟的正式考古挖掘。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和青铜器, 证明了新石器文明起源于中国, 此外还发掘出了大量的夯土台基。纪念性建筑物是柴尔德理论中“城市革命”的标志, 在殷墟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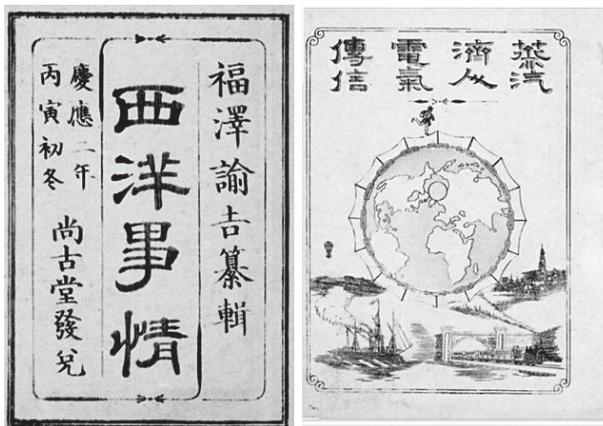


图 9: 福泽谕吉《西洋事情 初编》初版封面及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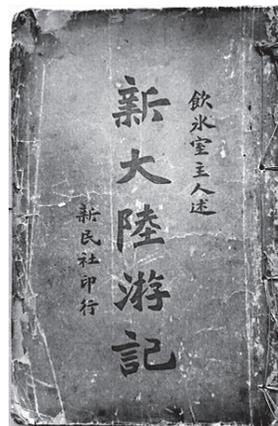


图 10: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初版封面

现夯土台基（图 11），就证明了当时纪念性建筑物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李济的弟子张光直（1931—2001）从 1954 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他深受柴尔德理论的影响，于 1962 年提出了中国的“城市革命”理论。张光直指出，由于中国早期城市与西方早期城市显著不同，中国早期城市出现的标志自然也与西方不同，而夯土台基就是中国早期城市出现的重要标志^[17]。这是一个双重的“发现”：既发现了夯土城墙本身，同时也发现了夯土城墙作为“城市”——即“文明”——的标志的意义。张光直的研究证明，中国具有独自的城市文明起源，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加入了“文明”的行列，不再是需要向外部寻求“文明”的“半开化”社会。张光直所做的固然是专业的考古研究，但我相信，这一研究背后必然洋溢着爱国热忱，尤其当我们了解到张光直出生于中国首都北京。此后，进一步上溯中国文明的起源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

那么日本又如何呢？越往前追溯历史，日本的城市（“都城”）、建筑与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关联就越密切，更不可能想象日本作为城市文明的起源了。于是，日本的学者们提出了另一条思路。足立康（1898—1941）于 1940 年编纂出版了《日本建筑史》，强调日本建筑产生于本国的土地和气候，而不谈与中国和朝鲜的联系。这种理论显然受到了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的《风土》（1935 年）一书的很大影响。淡化日本文化（包括日本建筑）在历史上与中国“文明”的联系，强调是日本固有的自然条件和气候孕育了



图 11：殷墟出土的夯土台基，中国“城市文明”的象征

日本文化，这种观念在当代日本依然有其市场。

一旦话题回到城市，日本就必须关注从中国传来的“都城”。日语“都城”一词特指“具有里坊制的王权首都”，暗含“表现为里坊制的‘城市文明’来自中国”这一前提。目前，日本学术界普遍认同日本最早的“都城”是位于奈良县南部的藤原京（694—710 年）。另一座历史更早的城市的实存尚有争议，她是《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里“倭人条”所记载的女王卑弥呼（？—247）政权的首都，日语称之为“都”，以区别于里坊制的“都城”。近年，有学者认为奈良县中部的缠向遗址就是该城。但即使卑弥呼的“都”确实存在，时代也已经是公元 3 世纪，至多是日本国内的历史问题，无法论及“城市文明”的起源。

20 世纪曾经出现过将日本城市史的探讨一举提升到“城市文明”高度的理论，那就是“绳文城市”和“弥生城市”。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是日本新石器时期的时代名称。二战后，为了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等术语广泛出现在历史教材中，显然有着爱国主义的影响。到了 1980 年代，泡沫经济推动下的大批城市建设带来了大量的考古挖掘成果。吉野里遗址（佐贺县，1986 年挖掘）、池上·曾根遗址（大阪府，1990 年二次调查）、唐古城遗址（奈良县，1999 年第 74 次调查）等成果，证实了日本在公元前 4 世纪曾存在大型环壕聚落，遗址中的大型柱洞更被认为证明了人口聚集和纪念性建筑物的存在。于是，“弥生城市”的说法



图 12：青森县三内丸山绳文遗址的巨大柱洞，日本“文明”起源的象征

在日本风靡一时^③。这种说法显然参照了摩尔根等人的理论，以及柴尔德“城市革命”的十项标志。

这些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日本本州岛北部青森县的绳文时代三内丸山遗址。1994 年 7 月，在这里发现了 6 个巨大的柱洞（图 12）。调查显示，柱洞是由直径约 1m、入土深约 2m 的栗木柱形成的。这一发现在日本考古学界甚至日本全国都引起了轰动。哲学家、文化评论家甚至考古学家都认为这些巨型柱洞和当地的聚落、陶器、食物残渣等是“城市”（即“文明”）曾经存在的证据。主持三内丸山遗址考古的学者基于遗址的规模和聚落布局的“规划性”，将其命名为“绳文城市”^[18]，甚至有人据此提出了中国文明是从日本传入的说法。当然，“绳文城市”理论很快遭到了批驳，今天没有人再会把它当真，但三内丸山绳文遗址的发现确实深深震撼了日本人的心灵。2021 年，以三内丸山遗址为核心的“北海道和东北北部的绳文遗址群”被登录为世界遗产，其背后的爱国主义可窥一斑。

五、结语：城市代表文明吗？

在文章的结尾，让我们再次回到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芒福德喟叹于当时美国城市的状况，称其为“城市文明的崩溃”。他将城市的崩溃视为人类文明的崩溃，延续着柴尔德“城市即文明”的观点。但是，既然城市已经失控，损害了人类的利益，那城市还是“文明”吗？难道不是“野蛮”吗？

成书于公元前 14 至前 13 世纪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图 13），记述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乌鲁克——的国王吉尔伽美什的英雄故事：吉尔伽美什打败了森林的守护神洪巴巴，征服了森林。历史上，当地的黎巴嫩雪松林确实曾被乌鲁克王国征服，为的是给城市生活和建造活动（炼砖）提供燃料。这片森林现已变为沙漠，固然有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还是由于城市发展对森林造成的



图 13：刻有《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楔形文字泥板

破坏^[19]。柴尔德基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现提出了“城市革命”理论，但这些考古发现同样强有力地证明了城市的破坏力。

上文我们曾提到“civilization”一词的起源，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为了抬高自身，将周边世界贬为“野蛮”的世界观。但是，按照《吉尔伽美什史诗》的记述，城市从来就不代表“文明”，而是代表“野蛮”。人类在地球上的聚落达到“城市”规模的时刻，正是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造成破坏的开端。城市文明也不应只是爱国主义的表象。我们需要基于更宏大的视野，重新审视历史上人类对城市的定义和期望，才能将城市指引向更美好的未来。

注释

① 公元 43 至 410 年古罗马帝国占领并统治不列颠岛南部地区时设立了不列颠尼亚行省，疆域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绝大部分地区。
 ② 十个标志是：人口（数量和密度）、职业分工、征稅、纪念性建筑物、统治阶级、文字、数学和天文

学、发达的艺术、定期对外贸易、国家。

③ 例如：広瀬和雄. 弥生都市の成立 [J]. 考古学研究, 1998, 45 (3) : 34-56; 等。现在“弥生城市”的说法被公认有误，详见：秋山浩三. 弥生実年代と都市論のゆくえ：池上曾根遺跡，改訂版 [J]. 新泉社，2023.

参考文献

[1] Francis Haverfield. Ancient Town-Planning[M].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13: 14.
 [2] Jennings, Justin. Killing CIVILIZATION: A Reassessment of Early Urbanism and Its Consequences[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16: 27.
 [3] Adam Rogers, Hingley Richard. Edward Gibbon and Francis Haverfield: The Traditions of Imperial Decline[M]//M. Bradley (Ed.), Classics & imperialism in the British Empire (189—2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3.
 [4] Adam Rogers, Hingley Richard. Edward Gibbon and Francis Haverfield: The Traditions of Imperial Decline[M]//M. Bradley (Ed.), Classics & imperialism in the British Empire (189—2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97.
 [5] Adam Rogers, Hingley Richard. Edward Gibbon and Francis Haverfield: The Traditions of Imperial Decline[M]//M. Bradley (Ed.), Classics & imperialism in the British Empire (189—2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3.
 [6]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Town Planning Conference, London, 10-15 October, 1910[M]. Routledge, 2011.
 [7] [美]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 [M]. 宋俊岭, 宋一然,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
 [8] Jennings, Justin. Killing CIVILIZATION: A Reassessment of Early Urbanism and Its Consequences[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16: 39-40.
 [9] 渡邊憲正. 明治期日本の「文明と野蛮」理解 [J]. 経済系：関東学院大学経済学会研究論集, 2013, 22-44. 参见：Albert M. Craig. 足立康, 梅津順一, 译. 文明と啓蒙：初期福澤諭吉の思想 [J]. 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 2009.
 [10] 安西敏三. 『西洋事情』における「文明」と「進歩」：福沢諭吉の歴史哲学研究序説 [J]. 法學研究：法律・政治・社会, 2003, 76 (12) : 221-244.
 [11] 川尻文彦. 清末思想研究：東西文明が交錯する思想空間 [M]. 汲古書院, 2022: 108-109.

[12] [J]. 清议报, 1899, 27, 1-6.
 [13] 川尻文彦. 清末思想研究：東西文明が交錯する思想空間 [M]. 汲古書院, 2022: 122.
 [14] 赵可. 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初探——以《新大陆游记》为中心 [J]. 社会科学研究, 1998 (5) : 104-109.
 [15]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 [M].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8: 81-82.
 [16] Tze-ki Hon. The Allure of the Natio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ebates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M]. Brill, 2015: 49-73.
 [17] Chang, Kuang-chih. Arch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of Some Cultural Alternates [J].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2, 177-197. 参见：张光直. 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 [J]. 文物, 1985 (2) : 62-67.
 [18] 岡田康博. NHK青森放送局. 縄文都市を掘る [J]. NHK出版, 1997.
 [19] John Perlin. 森と文明 [M]. 安田喜憲等译. 晶文社, 1994: 29-39.

图片来源

图 1: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图 2: https://openlibrary.org/works/OL4874573W/Ancient_Town-Planning
 图 3: <https://www.wnyc.org/story/206665-lewis-mumford/>
 图 4: 东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笔者拍摄
 图 5: https://openlibrary.org/works/OL4874573W/Ancient_Town-Planning
 图 6: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Town Planning Conference, London, 10-15 October 1910[M]. Routledge, 2011: 附录.
 图 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_Gordon_Childe
 图 8: Jennings, Justin. Killing CIVILIZATION: A Reassessment of Early Urbanism and Its Consequences[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16: 2.
 图 9: <https://iiif.lib.keio.ac.jp/FKZ/F7-A02-01/pdf/F7-A02-01.pdf>
 图 10: <https://www.riseweekly.com/liangqichao-2023-8-31/>
 图 11: Peng Peng. Decentralizing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Early Archaeological Efforts in China [J]. History of Humanities, 2021, 6 (2) : 515-548.
 图 12: <https://www.isan-no-sekai.jp/report/5778>
 图 1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pic_of_Gilgamesh